

收稿日期:2020-12-06

## 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中的人道主义诠释

刘向群,孙勇彬

(南京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奥斯卡·王尔德跌宕起伏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吸引了众多传记作家为其著书立传,其中,美国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所著的《奥斯卡·王尔德传》被誉为“传记艺术之华”,并荣获1989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这与艾尔曼在传记中体现出的深邃的人道主义精神密不可分。一方面,他能够洞见并展现王尔德在日常生活、文艺创作等方面所具有的人性光辉;另一方面,他对王尔德所遭受的不幸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并通过批判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对王尔德过度的道德审判,对王尔德作出更为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 人道主义;传记文学;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

**中图分类号:** I565.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1)02-0057-07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1319)。

**作者简介:** 刘向群(1997—),女,江苏盐城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孙勇彬(1971—),男,江苏盐城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记文学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21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小说、诗歌、戏剧以及童话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造诣。然而,由于同性恋问题,王尔德从意气风发变得穷困潦倒,最后妻离子散、客死异乡。王尔德的跌宕一生吸引了众多传记作家为其著书立传,“他从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沦为阶下囚的经历和在面对如此巨变时他的反应和感受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部分”<sup>[1]81</sup>,因此,王尔德的不幸成为若干传记家重点诠释之处,如海斯克·皮尔森《奥斯卡·王尔德的一生》(1946)、H. 蒙特哥马利·海德《王尔德的审判》(1948)、弗兰克·哈里斯《王尔德传》(1916)以及芭芭拉·贝尔福德《王尔德真天才》(2001)等。而其中美国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所著的《奥斯卡·王尔德传》广受好评,并荣获1989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作为“王尔德传记作品中最为璀璨的明珠”<sup>[2]</sup>,该书以第三人称立传,并未过度袒护或贬低王尔德。艾尔曼抛下旧时代对王尔德的偏见,以公平公正的态度考究王尔德的相关史实,一反过去过分美化王尔德生平或过度放大王尔德同性恋问题的传记窠臼,通过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笔触展示传主王尔德散发出的人性光辉;同时,发掘王尔德不幸命运的内因外因,对其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极力还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对王尔德“道德罪”的审判场景,为王尔德

研究提供有力佐证的同时,也体现出传记家的人道主义关怀。

### 一、对传主人性光辉的彰显

杨正润在《现代传记学》中提到:“人道主义(Humanism)最初的含义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对人性的认识是人道主义的基础,对人的同情、关怀和理解,是人道主义的精华和核心。”<sup>[3]200</sup>优秀的传记总是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传记家从史料中梳理出传主真实完整的人格,再现传主独特的个性,展现传主耀眼的优秀品质。在以往的王尔德传记中,有些传记作者或因王尔德的同性恋问题对其美德视而不见,甚至对其人格过度贬低,或因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对王尔德人性中的光辉过度修饰,在刻画真实具体的王尔德形象方面显得较为片面,且目的性过强,大多缺乏公平公正的传记写作态度以及对人性深刻的认识与思考。而在《奥斯卡·王尔德传》中,艾尔曼抛开世俗的偏见,一反以往的王尔德传记写作模式,通过表现王尔德深厚的文学素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入探寻王尔德人性中的闪光点,彰显了王尔德更为积极的一面,为替王尔德正名做铺垫。

艾尔曼详尽地展示了王尔德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他并未平铺直叙,而是从细节着手,挖掘世人未曾明了的事实,使读者见微知著。据艾尔曼的传记,王尔德从小就显露出在速读方面的才能,极具语言天赋。艾尔曼充分展现传主聪敏过人的特质: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阅读了大量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作品,并获得了包括伯克利金质奖章(Berkeley Gold Medal)和纽迪吉特奖(Newdigate Prize,牛津大学设立的诗歌奖)在内的多种奖项,还在古典文学的学位阶段考试和学位终考中均列一等。文艺创作上,他在戏剧方面也展现出惊人才华,他的剧本漂洋过海,在美国引起热烈的讨论。相关作品得到了著名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和沃尔特·惠特曼的青睐和欣赏,后者认为王尔德“始终是一道稳定的光线”<sup>[4]238</sup>。艾尔曼通过翻阅大量史料,将王尔德在文学上的天赋循序展现,令读者对王尔德的才华更加折服。

然而,璀璨的艺术成就并未遮掩王尔德熠熠生辉的道德品质。在艾尔曼笔下,王尔德拥有和他作品中人物一样热心又善良的性格特征。艾尔曼以细腻温和的笔触,通过描写王尔德对艺术事业的推动、对同行的提携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展现王尔德性格中真诚良善的一面。例如,他热衷于促进艺术事业、提携无名同行,在收到一位默默无闻的雕塑家的作品后,王尔德登门拜访并为其宣传,令这位雕塑家很快就拥有了迁居巴黎的资本;他还通过替艺术家争取订单、自己订购、口头宣传、邀请他们为自己画像等方式对贫困的艺术同行们施以援手。艾尔曼从细节出发,将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串联起来,告诉读者王尔德的善良品质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王尔德从不炫耀自己的恩惠,对于能力不足的人,他也习惯于耐心指导,给予改进意见。在艾尔曼看来,除了对艺术家们的帮助,王尔德“人人平等”的行事准则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并不歧视黑人,坚持让黑人男仆留在卧铺车厢;愿意冒着受罚的风险帮其他犯人递纸条,与他们平等地交谈;即使自己穷困潦倒,依旧愿意为可怜的士兵和三个孩子支付赎金。他温和有礼的态度、优雅机敏的谈吐甚至为他赢得了狱警的欣赏。他还憎恶暴君统治,对受压迫者充满同情。一场洪水过后,王尔德主动前往朗伯斯(Lambeth)支援。他为卧床不起的爱尔兰老妇人讲故事,并给她一些零花钱。时至今日,传记中狱警对王尔德的称赞已淹没在历史尘埃里,而艾尔曼从对人性的考察与探寻出发,借狱警之口吐露出自己对王尔德高尚道德品质的欣赏,正是人道主义精神在传记中的基本体现。

王尔德的优秀品质远不止于此。艾尔曼在传记中通过再现法庭上那场影响了王尔德后半生的判决,来展现王尔德面对困难和苦痛时无畏的勇气。当他即将被逮捕时,朋友们都劝他暂避风头,他却说:“我要留下来,接受对我的判决,不管是怎样的判决。”<sup>[4]611</sup>艾尔曼从人性的基本认识出发,对王尔德当时的心理进行了合理的揣测,使王尔德的勇气和骑士风度跃然纸上。对于王尔

德最令人诟病的道德问题,艾尔曼认为,王尔德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他试图迫使一个虚伪的时代接受他的本来面目”<sup>[4]584</sup>。结合时代背景可以看出,艾尔曼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将王尔德与整个社会作比较,体现传主拥有坦然面对、勇于担当的优良品质,从侧面削弱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对王尔德的偏见。在漫长而曲折的诉讼过程中,王尔德所谓的校友和朋友,或多或少为了获取利益或赢得名声出卖了他,有些人掩盖自身同性恋者的身份去揭发他,有些人甚至去做了污点证人。在传记中,艾尔曼详细叙述了这些人与王尔德的渊源和纠葛,让读者自行判断,并通过还原当时诉讼现场,表现以昆斯伯里等人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对王尔德的压迫。详尽的语言、行为、场景等描写极力展现社会对王尔德的偏见与舆论对他的迫害,充分体现了艾尔曼对人性深刻的观察、认识与感悟。他将整个虚伪的社会与王尔德相对比,有力地展现王尔德崇高的道德品质。即使王尔德最终被判入狱,他也表现出对逃跑的抗拒态度。王尔德没有选择逃避现实,也没有一味推脱或指责他人。他条理清晰的陈述赢得了满堂喝彩,他对背叛者的宽容令道貌岸然者感到羞愧。在这场充满了谎言和阴谋的审判中,王尔德的光明磊落与整个社会的虚伪自私形成鲜明对比。艾尔曼以“伪善”一词总结出时代特征。在传记家笔下,王尔德因为坦诚地承认自身性取向以及勇敢面对无情施加于自己的指控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种人性中的闪光点被伪善的社会所蒙蔽,却因为艾尔曼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而展现出来。面对牢狱之灾时,王尔德的勇气、宽以待人的处事准则和始终追求美的人生态度在虚伪暗淡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艾尔曼能够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分析王尔德的道德品质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传记家角度而言,艾尔曼对王尔德的人性光辉进行人道主义发掘似乎有迹可循。“传记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透过作品可以看到作者的自我。”<sup>[5]</sup>传记家通过挑选传主、观察传主、描写传主,将自身带入传主的荣辱一生中,此时,传记家与传主似乎融为一体,两者在很多方面具备了奇妙的同一性。比如,艾尔曼与王尔德在诗歌和演讲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两人博学多才,都曾担任牛津大学教授。王尔德的诗歌才华毋庸置疑。而艾尔曼对当代诗歌有着独特的见解,任何场合下,只要是有关当代诗歌的讨论,他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王尔德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时得到惠特曼的赏识。在演讲时,王尔德妙语连珠,除了擅长使用双关等精彩的语言技巧与演讲策略,还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作大胆的批评。而对于艾尔曼的演讲,他的一位密友如此评价道:“他吸引我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他在开讲时的艺术性:一个富有挑战性且常常诙谐的第一句话,伴随着一个小小的技巧,向听众发出一个信号,他很高兴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sup>[6]268</sup>又如,艾尔曼的风度和魅力也总是引人注目,他兴趣广泛,为人善良,能够凭借真诚的人格赢得周围人的喜欢。这些特质都与王尔德的个性十分相似。

《奥斯卡·王尔德传》延续了艾尔曼的传记写作风格。艾尔曼所著的传记似乎多为传主正名,如《叶芝传》和《乔伊斯传》。他认为叶芝是一个“伟大的天才”,而不是一个“聪明的爱尔兰怪人”。他突出了乔伊斯非凡的创造性,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者。艾尔曼所著传记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写作基调缘于他对文学总是充满敬意。据他的学生回忆,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身为美国现代主义学者的艾尔曼为了给妻子治病来到牛津大学任教。然而,当时牛津大学的文学研究氛围并非他所想象的那么宽松,英国文学研究界认为对尚在人世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并无特殊的科学价值。而艾尔曼的文学主张与之截然相反,他支持青年学者对在世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研究,积极帮助他们联系研究对象,并提供资料。作为现代主义学者,他支持女性学者,认为文本解释中同情谦卑更为重要。除了对学生或者青年学者、女性学者的支持与提携之外,他对社会中一些被视为偏见的观点也表示理解。“无论是美国的文学审查,还是爱尔兰对同性恋者的法庭审判,他都毫不迟疑地支持精神上得不到宽恕的受害者们。”<sup>[7]</sup>这种对于人的同情与理解充分体现了艾尔曼对人的关怀,而他在学术上的包容与支持也正与人道主义的精神相契合。这使艾尔

曼能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理解王尔德的文学主张,展现传主作品的价值和内涵,对于在维多利亚时期被认为犯了极大罪过的王尔德,艾尔曼也依旧能够从客观、辩证以及包容的角度出发,尽力还原历史真相,塑造更为真实丰满的王尔德形象,尽可能帮助大众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认识王尔德。

对传主王尔德优秀人格的真实刻画,可以给予读者深刻的心灵启迪,并帮助读者完成思想道德观的构建,发挥传记道德教化功能。这不仅是传记家对于人道主义的深刻认知,更是人道主义对传记文学的影响,也正是将人道主义融入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传主王尔德美好的心灵、博大的胸怀、执着的追求对于读者来说是极好的心灵、情怀与意志的美育教材;传主能够给人以人生哲理的启迪与审美鉴赏的享受;人们可以通过传主所闪耀的人性光芒感悟真善美及战胜内心的悲观和虚无。”<sup>[8]</sup>因此,无论是从读者角度还是传主角度,艾尔曼对于传主光辉人性的肯定、对普遍人性的认识以及对作品中人道主义的深刻领悟都至关重要。

## 二、对传主不幸人生的剖析

“对传主命运的解释,是传记解释中的核心问题。”<sup>[3]124</sup>这种解释不仅再现传主一生中最深刻的矛盾,更是人道主义在整篇传记叙事中的实际体现。王尔德人生的不幸是所有传记家进行传记写作时无可回避的关键问题。造成王尔德不幸人生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时代因素、社会因素,也有个人性格因素。因此,对王尔德命运的解读和诠释就成为传记写作的重中之重。而在以往有关王尔德的传记作品中,传记作者或因为自身思想局限,或因为自身利益,并不能公正客观地对王尔德的不幸进行诠释。如罗伯特·罗斯、斯图尔特·梅森等人的著作,有些“充满着事实错误”<sup>[9]</sup>,有些被“公认为是一本不可靠和自我中心的作品”<sup>[10]</sup>。就连王尔德的情人艾尔弗雷·道格拉斯所编撰的内容也更多地集中在维护自身的名誉上,“除了强调王尔德的生不逢时外,更多的是为他自己的名声作辩护”<sup>[11]</sup>。这种趋势直到20世纪才逐渐扭转,“随着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传记中的解释趋向的强化反映了对人的命运的越来越多的关怀和同情,主张人与人之间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人文关怀的表达进入了更高的层次”<sup>[3]125</sup>。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传记解释法渐趋流行。艾尔曼以生动简洁的笔触,用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文字展开传记叙事,极力刻画优秀品质甚于优柔性格的传主形象,在字里行间塑造起来的王尔德形象更为全面,更为丰满。因而,艾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更为客观公正,他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王尔德的人生悲剧做出了人道主义诠释。同时,传记家将心理方法同历史方法科学地结合起来,使行文更客观细腻,更容易引发读者对传主的同情。在对传主的不足之处进行描写的过程中,艾尔曼通过对传主的认真研究,逐渐发掘出传主错误、失败或者可笑的深层原因,由此对传主产生“同情性的理解”。又将传主为人诟病的另一面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相连,拉近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使传记在读者内心引起共鸣。

在艾尔曼笔下,王尔德的人生转折点,即他的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王尔德人生的方向。如艾尔曼所言,与道格拉斯的恋情摧毁了王尔德,这段不被所有人看好的关系成为王尔德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是导致其悲惨结局的最直接原因。然而,艾尔曼并未认为不幸的根源在于王尔德的“恋情”。在艾尔曼之前,王尔德的传记作者,如弗兰克·哈里斯,就“谴责道格拉斯在这场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认为他出于对父亲昆士伯里侯爵的敌意与让他出丑的欲望,怂恿王尔德不明智地进入诉讼,起诉昆士伯里诽谤。结果后者反诉成功”<sup>[12]83</sup>。艾尔曼再次以他对人性深刻的认知对王尔德的不幸做出人道主义的诠释。他认为,王尔德反复被情人道格拉斯伤害;听信道格拉斯的盲目乐观之言,与其父对簿公堂最终败诉入狱,身心受尽折磨;艰难出狱后回到花言巧语的道格拉斯身边,直到这个生性奢靡的青年花光他借来的最后一枚金币;被抛弃后饱受世俗偏见之苦。

一次次的伤害使王尔德坠入深渊,从成绩斐然的唯美主义大师一夜之间变成人人憎恶的“鸡奸犯”,身败名裂,债务累累,再也没能得到妻子的谅解,最后客死他乡。道格拉斯恶劣的人格缺陷正是整个上流社会奢靡不堪的缩影,腐朽的上层阶级扭曲了事实,导致王尔德诉讼的失败,进而使得他步步衰败。艾尔曼并未直接点明道格拉斯乃至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而是通过一系列场景、语言、心理以及动作描写,刻画道格拉斯等次要人物的形象,再现当年对王尔德充满恶意、无理苛刻的审判场景,透露出传记家对人性变化的深层把握,也展现出传记家对传主的高度关怀。

然而,艾尔曼也并未一味渲染或衬托王尔德人性中的“善”。王尔德被判入狱,与他恃才傲物、肆意挑战社会习俗有着密切关系,艾尔曼对此进行了细致分析。在有家室的情况下,王尔德仍与除了家世一无所有的同性青年道格拉斯成日厮混,一起挥霍金钱,四处享乐。尽管王尔德知道风险所在,但几经挣扎,他还是投入道格拉斯为他编织的谎言之中。王尔德一再同道格拉斯决裂,却又不断地原谅他。正如艾尔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对道格拉斯彻底摒弃之后,他又再次感受到了道格拉斯的吸引力——这是一种符合他的性格特征的转变。”<sup>[4]686</sup>这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性格缺陷预示了他的悲剧结局。艾尔曼诠释说,这是王尔德独特的悖论个性集中爆发的时刻:他既忏悔于之前挥霍了太多的才华,又迫于生计将手稿冠以他人之名;既愤怒于情人的肆意妄为,又一再地宽恕他的过错。艾尔曼发现了传主的不幸,并将层层事实抽丝剥茧,透过一个个现象发掘出王尔德的不幸根源。这种发现不仅需要传记家侦探般敏锐的洞察力,更需要传记家对人性的认识、理解和体悟。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作家置身于作品之中。“现代文学传记,如《王尔德传》,本质上都遵循博斯威尔的模式,即通过在传主生平中发现的线索含蓄地评论传主。”<sup>[13]11</sup>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传记家,艾尔曼尝试从生活碎片中寻找传主性格形成的轨迹。在《奥斯卡·王尔德传》中,他运用生活细节描写刻画王尔德的性格特征,并挖掘其形成的原因。

首先,王尔德在性格上流露出一种优柔感。他在色彩的选择上偏向女性喜好。他从小就能辨别和哥哥衬衫颜色的区别,日常穿着也多为颜色明艳、造型夸张的服饰,“对深红色和相关颜色的偏爱跟他的母亲如出一辙”<sup>[4]4</sup>。王尔德的母亲会把他打扮成小姑娘的样子,“奥斯卡在大约四岁时拍摄的一幅照片显示他穿着一身女装”<sup>[4]23</sup>。而即便在名声大噪之后,他所选择的服饰也多为艳丽耀眼的类型。王尔德在衣着打扮上流露出的些许“女人气”,仿佛暗示了他优柔的性格以及对出风头和享乐的追求。他的金钱观也透露出他对自身形象的看重以及在服饰装扮上的虚荣:“不管有没有收入,他都要花钱。有些钱被花在打扮上,他必须打扮得富丽堂皇才行。”<sup>[4]124</sup>这种价值观也为他日后入不敷出的悲惨境遇埋下伏笔。艾尔曼从色彩入手,将王尔德从幼年至成人时期的服装喜好进行比较,从而暗示王尔德性格上的优柔。然而,艾尔曼并未由此得出结论,相反,他认为仅凭色彩的选择并不能确定王尔德性格上的缺陷,转而通过分析王尔德性格形成的深层原因来加以论述。至此可见,艾尔曼以严谨、全面的传记写作观点对传主进行分析。这种写作风格不仅体现出艾尔曼对于事实的谨慎,也代表着他对王尔德的尊重与理解,侧面体现出他对王尔德在人道主义层面的关怀。

其次,艾尔曼认为王尔德的性格中始终伴随着一种深刻的的不幸感。一方面,妹妹过早的离世让他在青年时代就深切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人生无常的印象。另一方面,在牛津上学时染上的梅毒也对他的精神造成沉重的打击,“成为他忧郁情绪的发病来源”<sup>[4]181</sup>。这种不幸感在他的《厌世》等诗歌中皆有体现,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也为他羸弱的身体埋下不稳定的种子。另外,入狱前后生活环境的落差也加剧了他性格中的不幸感。社会对他的不断打击将他个性中的相悖性凸显出来。他的言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宣称即便在监狱里,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自由;另一方面又因为监狱逼仄脏乱的环境无比痛苦。为了周转资金,他还签署多份合同,同意让其他人代写他未动笔的剧本《达文特里夫妻》,违反了他所坚持的艺术纯洁性。他的宗教观念

也是如此,宗教身份一点也不正统的他最终接受了天主教的受洗礼,并称“教会的艺术性……会治愈我的性倒错”<sup>[4]774</sup>。这种想法与他之前宣扬同性之爱是美丽、卓越、最高贵的感情形式相矛盾,似乎间接否定了同道格拉斯的关系。

除此之外,艾尔曼认为,王尔德在对文学主张的推动上也暗含着一种“唯美的主观幻想”,他似乎更愿意将模糊的事实叙述成符合自身利益的文学观点,例如:他曾以阿里斯托芬描述阿伽松“容貌出众”来佐证其唯美主义的主张,而事实上,“阿里斯托芬比萝达·布劳顿更尖刻地嘲笑了唯美主义的女性气质”<sup>[4]126</sup>。他对事实抱有的浪漫幻想让他脱离了现实,同时也削弱了他依据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而现实的窘迫和打击迫使王尔德不得不转变他曾经为之感到骄傲的观点。此时,唯美主义中的艺术与现实仿佛不再难以相融,王尔德对自身文学主张的颠覆更是增添了传记结局的悲剧性。艾尔曼通过列举一系列事件,由外及里,由浅入深,将外界对王尔德的打击与压迫,王尔德自身心理的转变,王尔德性格中根深蒂固的矛盾感展现出来,既对王尔德相悖的性格特征进行详尽的刻画,又将塑造王尔德性格的因素娓娓道来。这不仅帮助读者真切感受到王尔德不幸的原因之复杂,也体现出艾尔曼对于史料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对于传主性格的深度把握与认知。

艾尔曼极力真实完整地还原历史,大部分情况下将判断历史的权力交给读者。无论是丰富的艺术成果,还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诟病的“道德罪”,他都在尽可能客观地展现王尔德丰满的人格形象,通过描述王尔德的作品,记录王尔德不同时期的经历,分析王尔德的性格特征,或描述王尔德的心理状态来帮助读者充分了解王尔德由顺转逆的人生。同时,他还根据王尔德的生活轨迹进行合情合理的判断,并顺应时代潮流,对王尔德做出符合当下价值观的客观评价。“……人物的悲剧色彩,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博大的胸怀所赋予的,没有这种包容一切的精神,就不会发现他们生命中的不幸。”<sup>[3]201</sup> 艾尔曼耗费诸多篇章描写王尔德的不幸,并深度分析王尔德不幸的直接原因与根源,除了再现历史情境,基于对传主往来信件、作品内容以及其他资料的深刻理解,艾尔曼在王尔德被批判的情感问题上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引导读者一步步探寻导致王尔德悲剧人生的深层原因。通过展现上层社会的逼迫、情人的背叛、自身性格的矛盾性等因素,解剖王尔德不幸的命运;运用真实细腻的笔触,从多方面刻画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王尔德形象。同时,将王尔德的不幸从偏面归咎于性取向转变为合理归因于王尔德的性格与价值观等内在原因,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舆论对王尔德过度苛责等外在原因。无论是将传主与背信弃义的污点证人进行对比、表现王尔德被捕前的坦然与勇气,还是描写入狱后仍旧显露的人性光辉,艾尔曼都尽可能地展现传主的文学才华及其同样不应被埋没的道德品质。其中,艾尔曼对人性正反方面的描写与分析正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传记家对人的细致观察和深刻认知的体现,他对于王尔德性格与心理的再现也体现出他对人道主义的思考与理解。王尔德逝去时,艾尔曼感慨王尔德蒙受的羞辱最终是到头了。如此一位文学之星沦落到需要死亡来终结羞辱的人生结局,显得尤为讽刺和可悲。艾尔曼的感慨既似惋惜又似庆幸,更多是叹息王尔德的顺境生活戛然而止,渲染了结局的悲剧氛围,引发了读者的深切同情。

艾尔曼立足史实,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充分挖掘了王尔德人性的光辉和不幸命运的根源,将读者的关注点从王尔德的“道德罪”更多地转向对当时伪善社会的批判,重新塑造了一个更为真实、全面、深刻的王尔德形象。艾尔曼笔下的王尔德所体现的善良、宽容、博学以及人格魅力征服了读者,他对王尔德悲剧性命运的深刻剖析引发了读者深切的同情。同时,艾尔曼真实、深刻、细腻的笔触也体现出传记家对人的深刻认识、对人性的理解与把握,展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传记作家对传主的同情与关怀。作为20世纪的优秀传记作品,艾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传》充盈着

人道主义精神,是研究王尔德及其创作不可多得的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吴铁群. 象征身份的剥离与重塑:阿克洛伊德笔下的王尔德[J]. 现代传记研究, 2018, 11(2): 80-93.
- [2] 臧晟露. 多重视角下的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研究[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9: 2.
- [3] 杨正润. 现代传记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4] 艾尔曼. 奥斯卡·王尔德传[M]. 萧易,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5] 杨正润. 传记文学史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16.
- [6] HART H. Richard Ellmann's Oxford Blues[J]. Sewanee Review, 2009, 117(2): 268-291.
- [7] DICK S, KIBERD D, MCMILLAN D, et al. Essays for Richard Ellmann: Omnium Gatherum[M]. Montreal: McGill-Queen's Press, 1989: xviii.
- [8] 李健. 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 146.
- [9] RABY P.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8.
- [10] 贺兰. 王尔德[M]. 李芬芳, 译. 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1: 142.
- [11] 张介明. 当代西方的王尔德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4): 26-30.
- [12] 谈瀛洲. 莫雷的《波西》[J]. 中国比较文学, 2001(4): 83-89.
- [13] 布鲁姆. 体现在作家身上的作品:传记批评系列总引[J]. 南方论坛, 2002(3): 11-12.

## Humanitarian Interpretation in *Oscar Wilde* by Richard Ellmann

LIU Xiang-qun, SUN Yong-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Oscar Wilde's ups and downs have attracted a number of biographers to write about his life, among which the most famous is American writer Richard Ellmann, who writes *Oscar Wilde*, winner of the 1989 Pulitzer Prize, which is highly praised for its humanitarian interpretation. On the one hand, Ellmann explores in depth the brilliance of Wilde's personality and his talents in literature and art; on the other hand, he expresses his sympathy for the misfortunes suffered by Wilde. He attempts to make a fair judgment of Wilde's complicated character and present an overall image of Wilde by exposing the excessive moral trial on Wilde in the British society during Victorian Era.

**Key words:** humanitarianism;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Richard Ellmann; *Oscar Wilde*

〔责任编辑:何敏敏〕